



文化寻根

张正军 著
WEIHUA XUNCEN

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范 谊 主审

文化寻根

——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张正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寻根研究主要集中于滇国青铜器文化、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历史、照叶树林文化、稻作文化、干栏式建筑、神话和民间故事、对歌、祖先崇拜等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类似的领域。研究的对象民族主要是傣族、佤族、哈尼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含摩梭人)等。本书从评析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开始,分析归纳了日本学者在云南开展的探寻日本文化源头之旅,可供从事日本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人员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张正军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ISBN978-7-313-05482-1

I. 文... II. 张...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云南省 ②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
IV. K280.74 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033 号

文 化 寻 根

——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张正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7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50

ISBN978-7-313-05482-1/K·059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史是很悠久的。《汉书》、《后汉书》、《魏志》、《宋书》及其他中国古文献记录了弥生时代(公元前 300 年左右~公元 300 年左右)至古坟时代(公元 300 年左右~公元 600 年左右)的日本群岛上的情况,日本学者根据这些古文献记载作了大量的研究。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日本群岛上的民族(我称之为 yamato 民族)开始积极地引进中国文化,因此,汉字在这一时期已经大规模地流入到 yamato 民族的中枢部门。其结果是 yamato 民族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掌握了中国式的教养,他们参照中国的书面文体,用汉字记录了 yamato 民族的文化。他们记录的第一本书籍是《古事记》(公元 712 年),其次是《日本书纪》(公元 720 年)、《风土记》(8 世纪中叶)、《万叶集》(8 世纪中叶)。因此,日本学者不仅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同时从明治年间(1868~1912 年)开始还特别把它们与 8 世纪编成的日本古典作品作比较研究。现在,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寻找《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和《万叶集》出处的工作已基本结束。近十几年来,学术界逐渐开始用计算机处理中国古典文献与日本古籍的数据,不久的将来,寻找出典的比较研究将达到接近完美的状态。

但是,另一方面,20 世纪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仅仅与中国古籍的比较研究是不充分的,还应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作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20 世纪末期,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从与古代中国的政治关系上来说,日本古代 yamato 民族处于现在所谓的“少数民族”的位置;从文化上来说,yamato 民族无文字,这些都说明 yamato 民

族是“少数民族”。如果从日本群岛与大陆隔开以来算,《古事记》在成书前有12000年的口传历史,即绳纹时代约11000年,弥生时代约600年,古坟时代约300年,7世纪100年。如果以其他未开化的社会为参考的话,即使是无文字的部落,一般也是有语言的,持续约12000年的yamato民族肯定也有歌唱的神话、男女对唱的恋歌和祭祀仪式上念的咒语等以某种声音符号表现出来的语言。这样,我们该怎样理解无文字时代的yamato民族的语言表现呢?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课题。其结果,我们明白了在比较研究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时有必要比较研究中国及整个亚洲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

因此,这一领域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必须掌握中国无文字少数民族的声音语言资料,我们必须用摄像机录下少数民族唱的神话和对歌以及祭祀仪式,根据各少数民族语言本身的发音,用国际音声符号把这些音声资料记录下来,使之文字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用少数民族语言唱的歌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文献中用汉字一字记录yamato民族语的一音的古代歌谣作比较研究。

学术界已经开拓出了这样的研究领域,所以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培育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这种人才必须具有高超的日语能力,这点与以往的要求是一样的,此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为了寻求活着的无文字民族的口头文学,必须具有进入定居于边境和山岳地带的民族村寨作田野调查的行动的能力;第二,不但能听懂汉语普通话,还要能听懂方言;第三,不但精通汉语和日语,还要多少关心各少数民族语言;第四,自己也要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思维意识。要完全具备这4个条件的人是凤毛麟角的,但是,本书的作者张正军先生是具备了这4个方面素质的研究者。

张正军先生不辞劳苦地与我及其他日本学者深入交通极为不便的边境及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村寨作田野调查,这是很了不起的资质。其次,他在云南大学执教14年,这使他能够听懂云南方言。他在陪同我作田野调查,记录用少数民族语言唱的对歌和神话中,也开始关心少数民

族语言本身。他在2003年获得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民族史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这说明他不但是日语教授,还将成为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专家。

这样,张正军先生在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把《古事记》以前的无文字的yamato民族语言文化模型化,即在探究日本文化之根的研究中,正在成为研究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他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中日两国的学会会刊上单独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化人类学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论文,其中《彝族的祭司——毕摩》(《冲绳与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基层文化的比较研究》,冲绳县立艺术大学附属研究所,2001年3月)、《20世纪日本学者对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之研究》(《亚洲民族文化研究》,亚洲民族文化学会,2004年3月)不仅显示了他高超的日语表现能力,同时也显示了他细致的田野调查能力,特别是后者,作者细致地收集了庞大的前人研究成果,显示了作者研究中的耐心、细心和独到的学术史研究能力。

我们现在迎来了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特别是构建无文字的yamato民族语言文化模型的基层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我再强调一下,张正军先生正在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我推测这一无文字的基层文化比较研究不久将对阐明仅凭汉字资料是看不见的、有文字以前的中国基层文化产生影响,这种研究对正在突飞猛进地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也是有诸多启示作用的。

我把少数民族中保持了原型性生存形态的民族称为“原型生存型民族”,并予以特别重视。所谓原型性生存形态指:①停留于低生产力阶段;②没有照明电、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器,没有塑料等化学制品,没有电话,没有公路和汽车,也没有自来水,即远离现代文明的产物;③无文字,基本上靠音声来表达口头文学;④在宗教上,没有人为宗教中的教祖、经典、教义和教团,以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精灵崇拜及以此为基础的原始咒术为中心,即使有人为宗教的传播,其人为宗教也因受到精灵崇拜和原始咒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⑤世界观以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精灵崇拜和原

始咒术为背景的神话世界为中心；⑥没有完备的国家体制，也没有建立本民族独立国家的意图。这种具备①～⑥条件的“原型生存型民族”保留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是流传到现在的“活化石”。

现在我们为追求便利的生活而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建设，但是，现代化建设也同时影响了作为人类生存原点的自然环境和地球本身。所以，人类不能容忍片面地追求现代化建设，必须设法缓和国家利益最优先的做法。“原型生存型民族”这时就能起到宝贵的示范作用。

我们人类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和国家体制带来的恩惠；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人类”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人类常常忘记了它。

随着全球性地推进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地区的“原型生存型民族”文化正在迅速地变质和消失。我推测，他们的文化完全消失大概还有10年或20年的时间，我将尽我所能，致力于“原型生存型民族”文化最后的记录工作，在这方面，张正军先生是我强有力的同志。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亚洲民族文化学会会长

工藤隆

2004年10月29日

前言

日本人寻根觅祖，已有悠久的历史，先后有阿伊努人说、大森贝丘说、克罗波科尔人说、南岛人说、原日本人说、日本民族纯血论、莱普查人说、骑马民族说、水界民说、西伯利亚人说、蒙古人说、云南人说、吴·越国人说、混血人种说等，然而，日本民族的起源，依然是个旷古之谜。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日本列岛的先民并非土生土长，而是远古时代从亚洲各地络绎迁徙而至。

日本现存最古的神话著作《古事记》(712年)、汉文史书《日本书纪》(720年)辑录了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然而，文献神话毕竟是死的，生活于现代的我们难以想象那些神话是由谁在什么场合以什么调子演唱的。日本的基层文化被认为是稻作文化，而研究发现，水稻及其稻作文化并不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是外来的稻作民族带入日本的。

佐佐木高明等日本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学者认为，从印度的阿萨姆经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长江以南至日本西部存在着照叶树林文化带，这里的稻作文化、干栏式建筑、神话和民间故事、对歌、祖先崇拜等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类似。云南是亚洲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像云南这样多民族聚居、不同类型的活形态文化保留较多的地区是极为罕见的，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文化类型、文化生态、民俗文化事象方面与日本同类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吸引着日本学者不断地来云南寻找失却的记忆，试图复原日本史前文化。自鸟居龙藏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次次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热，先后有南诏和大理国史研究、照叶树林文化研究、稻作文化研究、干栏式建筑研究、神树研究、唱的神话和对

歌等活形态文化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民族文化事项作了长期的、大量的调查研究,记录了行将失传的民族文化。有些成果以其客观性、真实性和学术性而引起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重视,弥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前,鸟居龙藏是第一位来云南对民族文化作田野调查的日本学者,他对彝族体质、语言文字、民俗文化的记录,有利于我们了解100多年前云南彝族的生活状况,成为人类学、考古学、比较民俗学界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白鸟芳郎、牧野巽、藤泽义美的南诏和大理国史研究,伊藤清司、君岛久子的神话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日本学者对云南民族历史文化所作的代表性研究。佐佐木高明提出的“东亚半月弧”理论认为照叶树林文化的中心地带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印度的阿萨姆之间。渡部忠世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间的假说。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开始深入民族村寨作田野调查。他们开始用摄像机拍摄少数民族的节日祭祀、唱的神话和对歌等活形态文化,开始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或国际音标、汉语直译加意译、日语或英语来记录唱的神话和对歌等,改变了以往叙事式的记录,调查研究的质和量得到了极大提高,学术界迎来了重新收集记录第一手资料的田野调查时代。这一时期,鸟越宪三郎研究了佤族的猎头祭祀和干栏式建筑,工藤隆研究了彝族和哈尼族等的神话、谱系及白族的对歌,提出了神话和对歌的8个层次论。欠端实研究了哈尼族的新米节和神树崇拜,諏访哲郎研究了纳西族的农耕民性和游牧民性,佐野贤治带领一批学者考察了纳西族和彝族的民俗文化,波照间永吉则带领了一批学者考察了彝族、白族、哈尼族的节日文化。

在日本,从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人员队伍庞大,且不乏一流学者。其中多数是照叶树林文化论、国立民族博物馆、中国民话之会、日本比较民俗学会和亚洲民族文化学会的学者,有一定的组织性。从研究的目的来说,有的是利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来复原日本奈良时代已失传的原始神话、对歌等,有的是为了记录某些即将失传的云南少数

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有的是在研究少数民族史。

近百年来,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征:①研究视野广阔。日本学者往往把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置于整个东亚、东南亚范围内来考虑,他们可去世界各地作田野调查,能把各地调查所得进行比较研究;②论证严谨。日本学者虽有宏观把握,但更着重微观论证,资料翔实,注重考证;③研究目的明确。有的日本学者把云南民族历史作为东南亚史的一部分来研究,有的日本学者却似乎具有文化寻根思想,至少是想通过对与日本类似的云南的民族文化事象之研究来复原日本已失传的上古文化。

本书从评析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开始,来分析归纳日本学者在云南开展的日本文化溯源之旅。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全貌、学术研究的轨迹及新动向,从而进一步促进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

张正军

2008年11月10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内容及前人研究概略	1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可比性	4
第一章 鸟居龙藏在云南的田野调查	9
第一节 鸟居龙藏在云南的调查线路	9
第二节 鸟居龙藏在云南田野调查的内容	11
第三节 鸟居龙藏在云南作田野调查的学术贡献	18
第二章 滇国青铜器文化研究	21
第一节 白鸟芳郎对滇国青铜器上可见的斯基泰文化研究	22
第二节 鸟越宪三郎对滇国青铜器上所见的人头祭研究	24
第三节 “滇王之印”和“滇委奴國王”金印	26
第四节 安田喜宪的滇国研究	30
第三章 南诏、大理国、傣族史研究	34
第一节 白鸟芳郎对南诏、大理国史的研究	35
第二节 藤泽义美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	50
第三节 日本学者对傣族史的研究	64
第四章 日本民族族源寻根	71
第一节 日本民族起源诸说	71
第二节 倭族之源与云南	76
第三节 日本的倭人源于古越人考	81
第五章 “照叶树林文化”论与云南	90

第一节	“照叶树林文化”论的提出	90
第二节	照叶树林带共同的文化事象	92
第三节	日本学者对照叶树林文化带的中心地西双版纳的 田野调查	93
第四节	照叶树林文化论的影响	95
第六章	日本学者对稻作起源地的研究	98
第一节	日本弥生文化的诞生	98
第二节	稻作起源于阿萨姆·云南间的学说	99
第三节	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说	104
第四节	稻作传入日本的路线	108
第五节	稻作起源地由一元起源学说向多元起源学说的发展	111
第七章	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	115
第一节	伊藤清司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研究	115
第二节	工藤隆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和对歌的研究	123
第三节	君岛久子等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	134
第八章	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和民间祭祀的研究	144
第一节	伊藤清司等对来访神的研究	144
第二节	鸟越宪三郎对佤族文化的研究	147
第三节	欠端实对哈尼族稻作祭祀的研究	154
第四节	樱井龙彦等对彝族祖先崇拜的研究	157
第五节	彝族神话史诗《梅葛》与日本神话《古事记》的比较研究	159
结语		176
附录一	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日本学术团体介绍	180
附录二	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日本学者及其论著	183
主要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19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内容及前人研究概略

一、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的是 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日本人所谓的民族文化包括汉族文化,但日本学者几乎没有研究云南的汉族文化,所以本书亦只介绍、评析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情况。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本书研究的是 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为了介绍近几年日本学术界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动态,所以也加入了 21 世纪的内容。从研究的内容上来说,本书只涉及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研究,不涉及日本学者对云南汉族的研究和中国学者在日本发表的有关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著作,也不论及日本学者对云南省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笔者掌握的英文学术著作有限,日本学者用英文发表的有关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未能在此作介绍。

日本学者对云南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滇国青铜器文化、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历史、照叶树林文化、稻作起源地和稻作文化、干栏式建筑、神话和民间故事、对歌、祖先崇拜等,主要集中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类似的方面,研究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复原日本上古文化。研究的对象民族主要是傣族、佤族、哈尼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含摩梭人)等。

本书以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为依据,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评析日本学者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成果。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各时期略有侧重,大致可归纳如下:

(1) 新中国建立前,鸟居龙藏对云南省的彝族、苗族地区作了田野调

查。日本学者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及研究始于1902年11月15日,当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之命,在云南实地考察了彝族、苗族,回国后出版了旅行日记及学术论文。新中国成立前,日本在中国的殖民范围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和沿海地区。虽然鸟居龙藏曾来过西南地区考察,1900年在上海创办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也曾来云南作大旅行调查,但因日本学者大多配合着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民族研究长期集中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即使是鸟居龙藏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其调查重点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

(2)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日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1979年前中国执行对外不开放政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内民族学、民族史学的学术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国外学者难以进入民族地区考察,所以,日本学者只能根据文献或中国学者在建国初所作的民族调查报告进行研究。白鸟芳郎、牧野巽、藤泽义美教授的南诏和大理国史研究,伊藤清司、君岛久子教授的神话研究都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日本学者对云南研究的代表。日本学者由于不能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所以有些学者就到东南亚大陆的北部地区、印度和尼泊尔,考察从云南等地迁徙去的山地民族,比较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相似性。1966年,中尾佐助教授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是这一时期经过田野调查而提出来的宏大构想,它对以后的东亚、东南亚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佐佐木高明教授提出的“东亚半月弧”理论认为,照叶树林文化的中心地带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印度的阿萨姆之间。渡部忠世教授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间的假说。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成果而提出来的理论。

(3)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日本学者纷纷前来云南考察。当时,云南尚有许多不开放地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贫困、偏僻、交通不便,不符合接待外宾的条件,有关部门对外国学者进行民族考察的时间和地点、摄像等作了限制,所以日本学者的调查只集中于昆明周围,西双版纳的景洪附近,大理、丽江等开放地区。日本学者在这时期的田野调查多与中国的大学、科研所联合进行,做了一些合作研究项目,或在各地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官员的陪同下进行。他们参照了中国解放初

搞民族大调查时积累的、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资料进行翻译、研究,出版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田野调查报告。照叶树林文化论者佐佐木高明、神话学家伊藤清司、历史学家白鸟芳郎等教授都是这一时期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

(4)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云南逐步实现了全境开放,有关部门对调查的时间和地点开始不作限制。日本学者开始深入民族村寨作田野调查,有些年轻的外国研究者甚至长期住在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中日学者通过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共同研究,学术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对研究对象作了更深入的分析。随着摄像器材的普及,日本学者开始不满足于根据以往经文人加工整理过、再由中文翻译成日语的少数民族资料来研究,他们认为经文人加工整理过的东西离实际太远,可信度较低。他们开始用摄像机拍摄少数民族的节日祭祀、唱的神话和对歌等活形态文化,开始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或国际音标、汉语直译加意译、日语或英语来记录唱的神话和对歌等,改变了以往叙事式的记录方式,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得到极大提高,学术界迎来了重新收集记录第一手资料的田野调查时代。这一时期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日本学者有鸟越宪三郎、工藤隆、欠端实、佐野贤治、波照间永吉等教授。鸟越宪三郎研究了佤族的猎头祭祀和干栏式建筑,提出了倭人源于云南的学说。工藤隆研究了彝族和哈尼族等的神话、谱系及白族的对歌。欠端实研究了哈尼族的新米节和神树崇拜。佐野贤治带领一批学者考察了纳西族和彝族的民俗文化。加治工真市、波照间永吉也带领了一批学者考察了彝族、白族、哈尼族的节日文化。这一时期,在日本的学术界,经常能见到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的论文、专著、调查报告和译著、译文。也涌现出了一批能说汉语的年轻学者,他们不需要通过汉日语的翻译中介,可以直接向会汉语的少数民族取材,作询问调查,横山广子、加藤久美子、林谦一郎、远藤耕太郎、川野明正、稻村务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前人研究概略

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早就引起了中国国内学术界的关注。部分国内学者参与了与日本学者的共同研究,还在日本发

表了论著,日本学者的某些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学术动态是较为关注并有所了解的。

自鸟居龙藏以来,日本学术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曾兴起过几次高潮。如:南诏和大理国历史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研究、照叶树林文化研究、稻作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有些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一定的介绍。如:尹绍亭、段晓明、白庚胜、杨福泉、张正军、刘愚山、巴莫阿依、黄建明、金少萍^[1]等翻译介绍了日本学者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此外,云南大学主办的《思想战线》也刊登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民族译丛》、《民族研究》也偶有翻译介绍。云南大学中日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举办过三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些都有助于介绍日本学术界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动向,促进了中日两国同行的学术交流,使我国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扩大了研究视野,提高了研究水平。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过于繁多,加上受语言的隔阂,中国学者仍然不能全面、及时、正确地了解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全貌。笔者在攻读博士期间,有幸能在日本研究一年,借机收集整理相关材料,通过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期望能对云南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效绵薄之力。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 日本传统文化的可比性

日本和中国云南相隔遥远,日本以海洋文化为特征,云南以山地文化为特征,日本学者为何要乐此不疲地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作学术考察呢?这是因为云南不仅是一个亚洲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而且与日本文化有很大的可比性。

一、共同的经济文化类型

日本与云南都具有类似的狩猎、畜牧、刀耕火种、旱作和稻作文化类型。学术界一般认为日本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左右~公元3世纪左右)确

立了稻作农耕,而这之前主要是狩猎、采集以及刀耕火种农业。实际上,狩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广泛存在于日本的东北地区。日本的部分山村直到近年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2]。日本的北海道至今仍有众多的牧场,牧民们从事着畜牧业。

在云南,历史上虽有著名的五尺道和后来的茶马古道,但由于受高山大河的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缺少往来,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所以,许多古老、类型多样的民俗文化存留了下来。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移风易俗,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兴起的商业文明都冲击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云南至今仍然保留了畜牧、旱作和稻作文化及相关民俗。在上述几种经济文化类型中,以稻作文化为主,一些原来以游牧、旱作为主的民族有向稻作转变的倾向,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只有少量残留。笔者前几年在大凉山彝族地区作田野调查时,当地的粮店仍以一比一的比率在交换当地产的荞麦和从外地运进来的大米,这说明当地彝族更喜欢吃大米。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边远的山区仍然有祭司在祭祀活动中吟唱神话,某些民族的年轻人仍然用对歌在寻找恋人,一些与日本绳纹(公元前1万年左右至公元前4世纪左右)、弥生时代相仿的习俗、信仰仍然保留了下来。而除云南以外的地区的古文化要么行将或已经消失,要么只保留于文献中。像云南这样多民族聚居、不同类型的活形态文化保留较多的地区是极为罕见的。神话、对歌、稻魂崇拜、神树崇拜、山神崇拜、祖先崇拜、宗教祭典、巫师驱鬼、走婚习俗,以及传统的建筑、服饰、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珍贵的古文化事象都吸引着日本学者前来考察。

二、相似的文化生态

云南处于南亚热带季风区、东亚亚热带季风区和西藏高原区之间,这里高山与谷底、西北与东南的相对高度相差很大。前述经济文化类型的存在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云南西北部的傈僳族、怒族、藏族、独龙族、彝族、纳西族和普米族多居住于河谷或寒冷的高山草地和针叶林带,经济文化以旱作、畜牧、狩猎为主;云南的南部和东南部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居住着傣族、壮族、哈尼族等,经济文化类型以稻作为主;苗族、瑶族、佤族等一般居住